

“幸福感”:发展中凸显人的分量

你幸福吗?网络上热议,电视里追问,人人感受不同,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然而,在众说纷纭中凝聚起共识:幸福,源于个人感受,更系于国家发展。

放眼中国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回应的正是人民对幸福的呼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GDP增长,更注重人在发展中的位置,认识到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发展不可持续。在旧有发展模式下,GDP上去了,个人财富增加了,许多人的幸福感可能并没有提升。

“幸福”的字样写入多省“十二五”规划,百余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目标,“人民”在十八大报告中出现145次。将幸福概念和人本思想注入执政理念,愈发凸显了发展中人的分量。义务教育全免费,农业税成为历史,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减贫6734万人……党和政府执政方略,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统一起来,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重增长到重共享,通过改善民生提升了人民幸福指数,也为科学发展注入新动力。

面对现实矛盾,努力实现公平正义,老百姓才能过得更舒心、更愉快。经济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基础,但仅仅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未必能够使人感到幸福。可以想象,假若就业靠“拼爹”、上学走关系、权益少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就会使人伤心、寒心,撕裂社会,造成对立。公平感的获得,权益受到尊重,在很多时候比财富的增加更重要。我们看到,“异地高考”的合理诉求渐行渐近,收入分配改革更加注重公平,公民“四权”得到保障,惩治贪腐绝不容情……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我们作出了努力,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实现公平正义正愈益成为老百姓的共识,不断强化人们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和憧憬,增强着人们的信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令人备受鼓舞。公平正义只有与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才能使百姓更温暖、更幸福。

瞻望未来发展,建设丰饶的“精神家园”才能使幸福有更坚实的依托。许多国家

现代化建设经验表明,离开文化的浸润和文明修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苍白和空虚,放任功利盛行,造成人际紧张,平添内心焦虑。温润心灵,涵养人生,成为当下中国的热词,表明人们渴望寻找幸福的归属。免费开放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全力实现广农村村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提高文化产品质量……这些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不少改变。低级趣味遭到唾弃,真善美得到弘扬,社会和谐因子不断增长,健康向上的社会取向,丰富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深刻思想内涵,提升了社会文明水平,为幸福注入不竭的源泉。

发展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政府工作的根本归依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当然,幸福生活不能靠赐予和施舍,而要靠自己不懈努力去争取。人们有理由期待,“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在这样一个美好愿景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参与者和创造者。(姜 贇)

“师生同考”有何不妥?

11月15日、16日是宿迁全市高三第一次统考,宿迁中学的学生们发现,任课老师也和他们一样端端正正地坐进了考场,认真地答卷。原来,这是宿迁中学今年新出台的规划,全校所有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教师都要参加高三的统考。宿迁中学校长办公室的朱主任表示,这项新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帮助年轻的老师尽快成长。参加高三统考,也是为了让年轻老师熟悉高考试卷模式、考试重点、难易程度,以在自己的教学中更有针对性。”(11月17日《现代快报》)

对宿迁中学的新规,不仅宿迁中学的教师有微词,不少网友也认为不妥,觉得师生同考多此一举,没有实际意义。笔者认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高中教师参加参加高三的统考,确有必要。

目前,国内高考择优选拔的标准还是应试教育,高三进入了高考准备的冲刺阶段,高三统考实际上是高考的模拟考试,是对即将进入高考学生实力及其准备情况的全面摸底,相当重要,负责指导高三毕业生高考的高中老师当然要对高三统考重视起来。这种重视不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而是体现在对高三统考的难易程度、难点与重点心中有数,以便加强高三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高考的升学率。师生同考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可让教师感悟考试的弊端,体味学生的艰难,萌发推进考试改革的思想火花,有何不妥?

现在,一些高中老师反映激烈,说白了,是怕考不过学生丢面子。由于各种原因,教师考不过学生再正常不过。教师的重心在教,设法帮助学生掌握应知应会的知识及技能,其能力体现在诸多方面,解题只是其中之一。学生的重心在学,学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应对试题的能力,学生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解题上,学生的考试成绩完全可能比教师要高。因而,老师大可不必为怕考不过学生而纠结。我们也不会用教师的解题成绩盖棺定论。不过,如果教师解答试题的能力很强,那不是更好吗?实际上,教学与考试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教得好,考得也好的教师是左右开弓的难得高手,师生同考正是要促使高中教师越来越多地成为这样的高手,这是高中学生的福音嘛。(于文军)

“怕得罪人不敢不收”的受贿理由很荒唐



广州城管队长受贿400余万元,称怕得罪人不敢不收。广州一名城管队长王宝林任职期间收受贿赂人民币共计432万元、黄金制品500克,分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庭审过程中,王宝林称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进行贿赂,这些中间人有权有势,如果不收得罪不起。王宝林还称:“这里就像一座庙,庙里有很多菩萨,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也不

是最小的小鬼。他们到庙里来上香,肯定不是只给我一个上。”(11月19日《新快报》)现如今不少官员落马后,都有一肚子的“委屈”,都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贪腐行为找借口。什么“人情往来”论、“工作需要”论、“维护关系”论……一个比一个冠冕堂皇,一个比一个“催人泪下”,仿佛这些人受贿实属万不得已,他们其实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不仅无罪,反倒“有功”。然而,事

实毕竟是事实,再绝妙的说辞顶多只能为其略遮羞,无法改变其受贿贪腐的丑陋本质。

“怕得罪人不敢不收”的受贿理由,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要知道,城管队长害怕得罪的,乃是有权有势的中间人。某些官员就是这样,他们不怕得罪党纪国法,也不怕得罪人民群众,他们只为权势折腰。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贪腐现象之严重、之普遍。

更耐人寻味的,是城管局长“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的表白。那么,到底谁才是“庙里最大的菩萨”呢?那些有权有势的“中间人”又是何方神圣?一个区区城管队长,受贿额竟已高达数百万。那些“菩萨”级别的“大人物”,背后又藏着多少惊人的内幕?相关部门理应顺藤摸瓜。然而,情理之中的事情做起来困难却可能很大。官场利益链往往一环套着一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事情如果深究,必然是一扯一串,一挖一窝。小鬼出了事,如果深究就可能扯出中鬼,深究中鬼就可能扯出大鬼、大大鬼……估计有很多人都不希望这样查下去,担心会影响“稳定”。

近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并要求“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我觉得,对东窗事发的贪腐案件一追到底、扩大战果,把那些有权有势的“中间人”和“大菩萨”也揪出来,就既能体现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的决心,也能起到“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作用。 乔志峰/文 吴结/绘

9分入围者“羞”红了谁的“脸”

在温州一事业单位公开选调中,一考生考取9分进入面试,三位考取50多分的考生没有获得面试资格。昨日,一份温州龙湾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笔试成绩在网上流传,并引发质疑。(11月20日《新京报》)

得9分者进入面试环节,着实有点说不过去。主办方解释是因为考生所报的文化馆总共就有3个人,招一人,按照3:1的面试比例,考多少分都得让进面试。话虽然这样说,可是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光彩,在龙湾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面试结果中,仅仅公布了考生准考证号、成绩外,并没有其他准确信息。看来,主办方考虑得还很不错,顾及了考生的颜面问题。

但是,在本人看来,更应该脸红的是温州龙湾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从考试流程看,该局选拔录用人才是以笔试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笔试成绩没有达到一定标准的,就不能有被聘任的机会。既然文化课程考察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即使是3:1的面试比例,也应该有个入围的标准,就是在卷子里面拔大个,也不能不管不顾,削到筐里就是菜啊。9分者入围,这对文化课考察工作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啊。

虽然,该局说9分考生在面试环节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证明该局考察人才还是有一定标准的和底线的,如果真是这样,何不把这个标准再往前提一提呢,提到笔试的那个阶段,规定出笔试成绩的最低限,或者针对选拔专业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适当在考题的难易程度上酌情考虑,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伤害;二是也给局里减少了麻烦,省去了对不“中意”人员去组织笔试的工作,还能节约人力、物力,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这件事,我们多么希望在以后的招聘组织中,如果主办方能考虑得再周全一些,再科学一些,再合理一些,那将避免多少尴尬啊。(姜炜宏)

父子“前腐后继”谁之过?

通过伪造装修合同骗取477万元拆迁款,并伙同父亲刘希泉受贿41万元购买宝马车。近日,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泉之子刘伟因诈骗罪和受贿罪被一中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1月19日腾讯网)

两个月前,时任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泉因受贿190万而“落马”,现如今其子也锒铛入狱,等待着的是20年的铁窗史。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这刘氏父子显然把团结的劲儿使错了地方,妄想互帮互助地捞好处,最终“福利共享”没实现,却让这个建立在贪污腐败基础上的家庭成了一叶扁舟,被堕落的洪水所淹没。笔者不禁唏嘘,在这个“拼爹”的时代,“我

爸是李刚”的招牌有时反而成了引火上身的“种子”。

显然,刘伟“铤而走险”是怀着侥幸心理,但区长之子的“标签”无疑是其制胜的“法宝”。每一次的“捞好处”,都是其父在疏通关系,在骗取国家拆迁款的过程中,更千方百计地合伙造假,如此“不劳而获”或许还真是遗传,难怪网友们用甄嬛体调侃:“父子”组团腐败真是嚣张极了。笔者以为,父爱过度“惹的祸”是事实,然而,廉洁防线被“冲垮”更是主因,酿成了这父子“前腐后继”的悲剧。

当然,刘伟的“成功”,除了其父开辟的“绿色通道”起了作用,也暴露出官场对干部“身份”大多买账的现实“潜规

则”,令人担忧。试想下,477万的“骗补”既能躲过层层关卡,除了客观存在的审核“漏洞”外,又有多少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暗中“庇护”,正是这项“乌纱帽”成了万能的“pass卡”,才让这父子俩的贪腐路越走越荒唐。内因的诱导,外力的“助长”,畸形的温床得以泛滥。

父子接连“落马”的悲剧成了舆论热议的谈资,可笔者更希望,这不仅是个笑话,更该是个教训,提醒为官的父母,别被爱冲昏了头,用些离谱的法子走“捷径”,最终害了下一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官二代”更引以为戒,莫拿长辈的身份“撑腰”,自食其力的奋斗才是最佳选择,不然最终自己翻了船,更连累了家人受苦。(安之若素)